

闽人传奇

说史谈厝

王景弘:挥师八下西洋 功勋汉史流芳

□张永和



▲《天妃灵应之记》碑
▲郑和(右)与王景弘(左)的雕像(国家海洋博物馆展品)

福建自古就是制造海船基地,更是萌发开发海洋功勋人才的宝库。福建乡贤王景弘与郑和共同率领庞大船队七下西洋,继而奉旨单独指挥八下西洋,功垂青史,亦是神州对外开放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里程碑,对于推动我国与亚、非国家和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和社会各界交流,发展国际的睦邻友好关系,促进我国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进步,均产生深远积极影响。

对于王景弘在郑和使团中的地位,在第一次下西洋时就已确立。据《明史》记载:“永乐三年(1405年)六月,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。”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出发前刊立的《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》碑等均有明确记述:“明宣德六年(1431年)岁次辛亥,正使太监郑和、王景弘,副使太监朱良、周满、洪保、杨真,左少监张达等立。”

这对结拜为师兄弟的亲密战友,在社会各界备受尊崇,德高望重。他俩不怒自威,慈眉善目,视民众为父母,待部属为手足;总是脸带笑容,充满个性魅力。海内外有识之士都赞颂这对亲密战友“四海誉为楷模,五洲传为佳话”。

“缘”从何来

中国文史出版社2019年3月正式出版笔者与王笑芳合著的长篇传记《王景弘传》,着力记述王景弘扬五洲四海的下西洋壮举,同时满腔热情讴歌郑和与王景弘亲密战友之深厚情谊,在海内外产生良好反响。著名评论家叶子发表评论文章称:“八下西洋壮举,功勋汉史流芳。”

正如俗语所云:“有缘千里来相会,无缘对面不相逢。”王景弘是东南沿海福建龙岩地区农家书香子弟,郑和是来自西南边陲云南的回教信徒,相隔千里,“缘”从何来?

他们当初都在朱棣燕王府内“打工”,王景弘先在内官管理花卉果园,后在书房抄写办事;郑和则在燕王府负责内侍,是日理四方的大管家。由于他们纯朴宽厚、耿直肃议、襟怀坦诚、机敏慧颖,尽心服务燕王,尽职尽责内外效忠,深得朱棣赏识,故经牵引线,结拜为师兄师弟。

法国著名哲学家伏尔泰在《哲学辞典·友谊》一书中写道:“友谊是灵魂的结合,这是两个敏感、正直的人之间心照不宣的契约。”而郑和与王景弘的战友情谊正是“灵魂的结合”“心照不宣的契约”。他俩在燕王府内书房一见如故,相识恨晚。在交谈中,他俩不约而同地从山谈到海,向往大海,期待着将来能投身于航海事业。

王景弘谈到家乡的山溪经九龙江流入东海,他遭遇过土匪劫掠,后在厦门海域脱离虎口,在泉州海域幸运逃过劫。王景弘与山村的乡亲们跟海洋织下特殊的情结,仅带“洋”字的地名在山乡就有上百个,例如后洋、洋坑、洋尾、赤洋、西洋、东洋、上洋、田尾洋、路兜洋、双洋镇、黄竹洋、东坂洋、南洋镇、宁洋县……而汹涌澎湃的宁洋溪,连接着洪涛接天、巨浪如山的海洋,留下多少未解之谜让人们去思考啊……

王景弘从交谈中了解到,这位师兄郑和祖居西域,阿拉伯贵族出身,后迁至云南昆阳州(今昆明市晋宁县)。明洪武四年(1371年)出生,原名马三保,又名马和(后被明成祖赐封郑姓,官称郑和)。他一直生活在山里,没见过大海,但从小就对航海兴趣浓厚。按理说明初航海并不是热门学科,而云南也不是出海之地,为什么郑和喜欢航海呢?

郑和向新结识的佛教徒师弟介绍: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经去过麦加。在郑和小时候,父亲经常对他讲述那朝圣途中破浪远航、跋山涉水的惊险经历和万里之外、异国他乡的奇人异事。这些都深深地影响了郑和,向往着大海洋。



郑和铸青铜钟,为第七次出使西洋所铸,腹中部为云水波浪纹,下部为一周铭文:“大明宣德六年(1431年)岁次辛亥仲夏吉旦,大监郑和、王景弘等同官军人等,发心铸造铜钟一口,永远长生供奉,祈保西洋回往平安吉祥如意者。”

王景弘这时了解到,也正是因此,幼年的郑和与同龄的那些孩子并不一样,他没有只坐在书桌前日复一日地背诵圣贤之言,以求将来图个功名,而是除熟读“四书五经”之外,还努力锻炼身体,学习与航海有关的知识。王景弘认为,郑和师兄注定是不会平凡地度过一生的,伟大的使命和事业似乎必定要由这些上天选中的人去完成。

建文元年(1399年)七月初五,燕王朱棣出兵“靖国难,清君侧”。郑和与王景弘紧跟燕王,在战火中均被委以重任。建文四年(1402年)六月十三日,朱棣挥师进入金川门,浩浩荡荡的燕军终于占领了南京。

圆“巡洋梦”

新朝伊始,万象更新。朱棣江山到手,更加器重郑和与王景弘,提拔郑和为内宫监太监,负责统管皇官事务;王景弘历来低调处世,但明成祖器重他肚里的文墨,封他为御用监太监。

明成祖在亲民安邦乃至征服沙漠后,做起“巡洋梦”来了。最先映入人们眼帘的就是西洋,需要说明的是,“西洋”这个名词在明朝的意义与今日并不相同,当时的所谓西洋其实是现在的南洋。前代朝廷虽也曾派出船只远航过这些地区,但只是比较单一的行动,并没有什么大的影响。海的那边到底有些什么,人们并不是十分清楚。而朱棣之所以被认为是历史上少有的英明君主,是因为他做了很多历史上其他君主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。

永乐年代是谱写传奇岁月的最佳机遇。朱棣安排郑和与王景弘出海有着深层次目的。除了寻找下落不明的建文帝外,郑和与王景弘还肩负着恩施四海、胸怀远人的使命。这大致也可以算是中国历史上的老传统,但凡强盛的朝代必定会有这样的一些举动。如汉朝时贯通东西的丝绸之路,唐朝时众多留学生来到我国学习先进的科学文化技术,都是这一传统的表现。

强盛于东方之中国的光辉是无法掩盖的,当它的先进和文明为世界所公认之时,恩施四海的时刻自然也就到来了。朱棣意识到自己的天职,决心把一件历史上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交给郑和与王景弘来完成,这是光荣,也是重任。皇上深信,这对经历战火考验的亲密战友一定能够完成这一神圣使命。

八下西洋

皇上一锤定音,果断决策,郑和与王景弘挑起了远航西洋的重担。郑和走马上任,全面统管下西洋要务。王景弘身兼总兵,具体部署2万多名水师的练兵规划。之后,由北至南沿海而下,快马加鞭督造船舰,收购土特产品,为下西洋做好充分准备。

永乐三年(1405年)7月11日,“一帆风顺,鹏程万里!”在明成祖朱棣一声令下,郑和与王景弘率领的200多艘船舰,满载2万多名官兵的庞大船队,声势浩大驶出了江苏太仓刘家港,途经福建长乐太平港,向茫茫大海扬帆前进。

从1405年(明永乐三年)到1433年(明宣德八年)的28年中,先后进行了七下西洋的大规模航海活动,遍访亚非沿岸30多个国家和地区,郑和与王景弘率领庞大船队官兵,在人类航海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;也为这对师兄师弟的战友情谊,奏响了“灵魂的结合”的凯歌。

在七下西洋的日日夜夜,郑和与王景弘并肩战斗,率领庞大的船队,战险恶风浪,击土匪海寇,保航海安全,护官兵健康。同时,身体力行弘扬中华礼仪,迎送各国国王与使节,开展友好外交往,搞好对外公平贸易……

在海外长年餐风宿浪,王景弘的第一要务是确保郑和平安健康,政令畅通无阻。他在船队内外密布火眼金睛,发现叛逆苗头,及时精准处置——

当船队航至马六甲海峡附近的千岛之国,吴川副使勾结匪贼,妄图暗害郑和以抢夺

船队指挥大权。在千钧一发之际,吴川刚要下毒手,王景弘猛然解开胸襟,从怀中掏出皇上早已授予他紧急备用的御林铁券,高高举起,朗声说道:“见铁券者,如闻朕声,如临朕面!皇上有旨!”

船上官兵不约而同地“啊”了一声,情不自禁地跪倒在舱板上。吴川惶恐地望着王景弘,一时不知如何是好,脑子里转了几道弯,无可奈何在御林铁券下跪了下去。王景弘当机立断,命卫侍把吴川反手捆绑起来,然后大声发布命令:“吴川违旨,公然叛国,投降海寇,甘当匪贼,妄图杀害郑和,窃取高位,该当何罪!现在,本职奉旨发令,解除吴川职务及其颁发的所有命令,待返航后交由皇上处置。大明船队水师仍由郑和统领,各级文武官员,必须严守此令。抗命即是抗旨,格斩不赦!”

郑和听着王景弘发布的声声命令,如同春雷在耳畔轰鸣。他突然想起皇上对他道出的心腹之言:单独委派郑和或王景弘作为下西洋的主帅,都欠妥当。正确的决策是,下西洋是大明帝国的头等大事,应该让郑和与王景弘肩并力,共同完成这一历史上第一次的航海万里长征!

原来,王景弘早从潜伏渤林邦国密探处得到情报,立即指派精兵一行特别警卫郑和。当吴川在“议事堂”宣布伪造的密旨后,郑和沉着镇定,深信王景弘该出手时当出手。果然,明成祖皇上英明,有预测,吴川叛国阴谋才未能得逞。在关键时刻,吴川谎称“伤重而亡”的郑和现身“议事堂”,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……

这时,远处海面传来隆隆炮声,匪贼假投降后又纠集海寇们从外海突然袭击郑和船队。在王景弘指挥下的百艘明军船队,早已早有备而来。当匪贼发起突袭,顿时杀声四起,火炮齐鸣,5000多名匪贼,20余艘海寇船舰被分割包围,成了明军靶子。匪贼万万没料到,那位满脸和气,和蔼可亲的一瞬间从慈父变成猛虎,真是大大地上当啊!

捷报传来,“微乎微乎,至于无形,神乎神乎,至于无声,故能为之司命”,郑和赞扬王景弘指挥有功。考虑到海寇大多是爪哇人,郑和把海寇俘虏转移交给当地“海外西王”处理,只把匪贼要犯押回大明呈交皇上处置。

郑和与王景弘连夜赶写了奏章,将这几起特殊事件急报朱棣。同时,宣布明军水师继续在爪哇休整,并派出农技官员深入当地农村,推广大明先进农业科学技术。

西王都马板同郑和走访爪哇各地,把大明优良品种分发给当地农民,特别是把早种稻谷改革为水稻种植,大大提高了产量和质量。西王盛赞郑和:“郑大人,我们爪哇有多处的三宝垄,跟你同名字,你此行送给我们的何止三宝(宝品种、宝礼品、宝技术)呀!”郑和朗声笑了起来,说:“西王大人过奖啦,我们下西洋的目的,就是为了世代友好交往……”

宣德六年(1431年)仲冬,郑和与王景弘率领船队,缓缓驶出福建长乐太平港,正式开启第七次下西洋的远航。郑和刚好六十高龄,进入耳顺之年,同事们都劝他好好休息,恐恐航不堪重负。郑和也知道自己身体日渐虚弱,本该解甲归田,然而上命难违,朱棣病逝,下西洋难度更大,而心中航海尚有未了之情,毅然再次踏上跨海征程。

王景弘把他安顿在主帅宝船上,劝导说:“郑和师兄,宣德皇上有旨,嘱我要保重你的健康,关照你的休息!”郑和紧紧抓住王景弘的手,深情地说:“景弘师弟,我们这辈子合作得很好,是最大的幸运啊。船队的大小事情,你大胆管起来!”

王景弘埋头苦干,把船队重担挑了起来,让郑和好好静养休息。但郑和的病情一天天严重,太医们用尽千方百计,也未能把他的高烧退下来。这时,大明庞大的船队不分昼夜地向大洋驶去。随着船队越行越远,气候变了,大海一片黝黑,波涛汹涌,狂风呼啸。突然,天空竟然飘动着片片雪花。甲板上的水手们将雪花接到手中,惊恐地叫喊起来:“天哪!这是什么地方?三伏天竟下起雪花来啦!”

这紧急情况引起王景弘焦虑,匆匆跑进内舱禀告:“郑和师兄,我们恐已进入真正的天涯海角了。这季节,大明酷暑,而这里却雪花漫天。凶险莫测,为师兄健康着想,我看,我看……返航吧?”

郑和被重病折磨着,还是勉强笑了笑,强挺起精神,挥手阻拦说:“不!绝对不能返航!别说雪花,就是下刀子,船队也要南行,按皇上旨意:下西洋!”

王景弘无可奈何地回应:“遵命!”郑和知道师弟的好意,紧急返航的是让他回到京城得到更好医治。但他下定决心,紧抓王景弘的衣衫,用断断续续的口气,严肃地下达命令,要是他断气了,就葬入大海。这叫海葬!天下最隆重的葬礼!他命王景弘不能返航,要率领舰队继续前进,排除万难,坚决完成皇上下西洋圣旨!唯此唯大也!

强忍着悲痛的心,这一夜,王景弘怎么也睡不着。雪花漫天盖地飘了一夜,直到凌晨,风卷雪花才停了下来。突然,海平线上跳出一颗火星,映出一片红光,把甲板照耀得分外晶莹,鲜艳万分。就在此刻,郑和在主帅宝船上停止了心跳。伴随着太医的呼唤,一缕阳光从舷窗透射进来,海神天妃塑像前,一支残烛摇曳欲灭,挣扎着闪了闪,最终悄然熄掉了,升起一阵轻烟。

这时,庞大的船队已到达古里,这是他多次到达的终点站。也许是老天有意安排,郑和实现了他生前的宏愿,天荒地久地停留在天涯海角。

太阳已升上中天,海上风平浪静,庞大的船队就地停航,遵照郑和生前遗嘱命令,官兵们密密麻麻地站在甲板上,为下西洋的主帅郑和举行隆重的海葬……

船队老迈的书记官捧着一本厚厚的《航海日志》,颤巍巍地走到文案前,庄严社会,动作沉重地挥笔。王景弘悲痛地发出断断续续的嗓音:“宣德七年(1432年)八月十日,大明水师下西洋舰队正使郑和,病逝于巡洋途中,享年六十二岁。正使王景弘,率全体官兵,为其举行海葬……”

驻台“数旬”

在善始善终完成七下西洋重任后,王景弘不久单独奉旨统率庞大船队官兵八下西洋,把明宣宗朱瞻基的大明新政理念向四海宣扬。

自古道:“同德则同心,同心则同志。”王景弘继承亲密战友郑和遗志,奉皇旨持续八下西洋,在轰动海内外的航海史册中闪烁着又一光亮点,那就是关注祖国宝岛台湾,宣示中央政府台湾的管辖主权,也为后续施政者传递了国家主权归属的关键信息。

闽台有缘。身为闽籍的王景弘,对海峡彼岸的台湾格外关切,在逐浪追波的航程中专程登台驻“数旬”,彰显对祖国领土管辖的神圣职责。王景弘统率的船队拥有二万八千名成员、两百多艘船舰,这支奉皇命派出的庞大船队有着严密组织系统,其在台湾驻“数旬”,同当地居民进行了广泛的接触,传播祖国大陆先进的文化和农业生产、保健医疗技术。军民同心协力全歼来犯海寇,佑我领土领海安全。同时,秉公处理船队成员同当地居民交往中产生的问题,大大扩大了明朝中央政府在台湾的影响。

自王景弘八下西洋之后,大陆人民移居台湾数量逐年增多,为1662年郑成功从荷兰殖民者手中收复台湾奠定了基础。福建与台湾只一水之隔,福建从古至今与台湾关系密切。所以,王景弘对台湾有着特殊的感情,在台湾也流传不少与之相关的传说。王景弘登临台湾,寓意无穷,亦是郑和与王景弘亲密战友友谊为后人结下的又一丰硕历史性成果。

加强王景弘与台湾关系的研究,对于进一步推动海峡两岸学术和文化的交流与合作,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,无疑有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的特殊意义。

严复家训中的家国情怀

□陈义

“孝亲敬长”与“家睦人和”体现了古人对于家庭伦理关系的基本要求。严复虽然曾留学游历西方多年,但他还是深受中国传统家庭伦理观念影响。他看到了西方家庭婚姻观之中的一些消极因素,对于重感官肉欲而漠视责任、轻易离婚等观念持否定态度,指出“西洋诸国大抵妻不子匹合矣……夫知道苦,由是而二弊生焉,一曰不事嫁娶,一曰轻为离异”。

即使在外工作繁忙,严复也不忘经常与子女通信,了解近况并交流感情。“多日不见几信,甚深悬念”“大大在山养病,极念吾儿,吾儿切勿听话学好,不然大大就不疼吾儿了”“家中平安,但母亲寂寞,吾儿须知承欢听话,莫作吵也”……从一封封家书中,可以感受到一个父亲慈爱的形象。

严复的胞妹早逝,何幼兰从小由严复抚养长大,他对这个外甥女的关心不比亲生子女少,双方书信往来十分频繁。他在给何幼兰的信中曾写道:“吾年日老,姊妹所出只汝一人,故于汝身更加怜爱,较之于女有过无逊。”言语间,亲情与关爱之心一览无余。

严复也很注重对晚辈的“孝道”教育,希望子弟们多关心长辈的生活。他曾在给夫人朱明丽的家书中批评三子严毓疏于对其生母的关注,指出:“普贤之切盼儿女作信与他,普贤乃不肯以一字慰其母,此儿真不孝也。”

当他得知外甥女何幼兰牵挂自己的身体状况时,欣慰之情溢于言表,并回信道:“接到廿五日缄,知因身体气弱,几挂怀无已,仁孝可感。”

严复认为家庭成员间既要相互关爱,也应遵守基本的礼仪,这是家庭和睦必不可少的前提。有一次适逢严复发妻王氏忌日之际,长子严璠要求同父异母的四弟严璠、五弟严站“代劳拜佛”,结果弟弟们不仅以“迷信”为由拒绝,而且在言语上还使长兄难堪了一番。

严复知情后,在信中严厉训斥了严璠与严站,其言辞之激烈实属罕见:“汝真该打,吾儿当知,迷信事小,而我诸子中,有以幼弟伤长兄感情,却是极大关系。”在严复看来,“烧香拜佛”与“科学”之争论乃小事,不敬兄长,致使兄弟间的人伦亲情受损才事关重大,可见严复在家庭生活中十分重视对子女的传统家庭美德教育。

严复救亡图存的爱国情怀,也深深影响着严家后辈们。他在给严璠的信中指出,甲午中日战争失败与中国落后的原因在于“平日学问之非,与士大夫心术之坏”。因此,他希望家子弟能接受良好的教育,将来学有所成,报效国家,成为一个对国家、社会有价值的人。严复曾在家书中勉励严璠“有志之士,须以济世立业为务”。

严璠14岁时就被严复送到唐山工业专门学校求学。严复在给严璠的信中写道:“惟是男儿志在四方,世故人情,皆为学问,不得令尔兄弟离膝下。”他并不像传统的读书人那样要求子弟以“为官”为职业选择或人生态向,而是根据子弟的个体情况来规划,“所治何科,所执何业,亦就少年性质之近而喜者,无所专尚也”。严复认为只要对社会、国家发展有所贡献,人生的成长成才可以通过多元方式来实现。

伍子严伯黎赴美留学,在专业选择上存在困惑。严复从国家需要和民族利益的格局出发,极力劝导严伯黎学习西医,强调:“故吾意不如仍习医药,盖西医一科,欧美进步奇猛,为国民计,须得多数人勤治此科。”在得知何幼兰想创办女子学校,严复马上写信鼓励她“虽千万幸,总须于社会着实有益,可与后来人取法”,还表示自己愿意到外甥女办的学校担任教员,并就如何办校提供了不少指导意见。这些都彰显了严复希望后嗣能够济世为民、建功报国的家国情怀。

严复虽被誉为“中国西学第一人”,也希望家子弟在求学过程中“得有时日多看西书”,但他并不主张“全盘西化”,而是倡导“统新故而视其通,苞中外而计其全”,对于中西西学秉持一种“会通中西”的观点,也就是说,在那个醉心欧风、西学激进的年代,严复没有忘记中华民族的国学。相反,他认为扎实的国学基础是掌握西学的前提,应当让子女“先治中学”,充分领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,到了十四五岁之后才“放手治西书”,这样才会在中西对比中更深入地思考、相互借鉴。

他曾指出“今日国中无伦何等学校,皆非学习真正国文之地,要学习须在家庭”。因此,他为几个儿女聘请了桐城派金于善为家塾先生,专教国学知识。即便在外求学,严复也认真叮嘱儿子:“暇时仍当料理旧学,勿任抛荒”,尤其应诵读《资治通鉴》《左传》两书。其去世前的一条遗训:“须知中国不灭,旧法可损益,必不可叛。”充分诠释了一位爱国学者对于中国传统文化价值的辩证思考,以及对于子女勿忘“根脉”的谆谆教诲。

严复育有九个子女,性格能力皆有差异。严复遵循因材施教的理念,进行相应的教育引导。例如,严璠生性笃实勤奋,不甘人后,特别在意学业成绩和老师的评价,初到唐山求学时不适应新环境,严复经常与其书信往来并开导:“课堂得佳评,固不足喜;得恶评,亦无须懊丧”。当得知严璠因学习过于刻苦用功伤了身体时,严复写信反复叮嘱要以身体为重,并勉励严璠努力就好,对于一时成绩不必太过在意,并安慰:“考试原求及格,但人事专尽之后,即亦不必过于认真,转生病痛。”

严璠年轻时学习浮躁,不够踏实严谨,有一次在信中将新历旧历混用,严复在回信中批评儿子“用新则纯新,用旧则纯旧,不可乍阴乍阳,必致混乱误事”。通过这一细节,他教育儿子要踏踏实实做人做事,切勿心浮气躁。

严复一生以救国为己任,即使在临终之际,也再三叮嘱子女“事遇群己对待之时,须念己轻群重,更切勿造孽”,深刻蕴含着“集体高于个体”的家国情怀教育。

(作者单位:福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)